

王羲之
遺墨

寶錄

王启星编

王 飞 遗 墨 广 录



却没余生敢抢时，

书生岂无惜少年！

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九日晨六时

王飞手迹

代 序

当年真知灼见的历史记录

——王飞、李慎之向毛泽东进言的前前后后

半个多世纪之前的1956年，对中国、对社会主义阵营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对全世界，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之年。这一年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跌宕起伏，发展轨迹之诡异，出乎许多人的预料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仍能感受到它们给中国和世界造成的影响。

当时国内是“莺歌燕舞”，一片大好形势：让美国这一世界第一强国，第一次没能赢得战争胜利的抗美援朝，已经结束；镇压反革命、高饶事件、反胡风集团等运动，也都过去了；农业、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，已基本完成。新年伊始，毛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，接受了私营工商业改造完成的喜报。4月份毛主席发表了让人耳目一新的《论十大关系》。5月份，陆定一同志又根据毛主席的思想，发表了在社会阵营从来没有提出过的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报告，进一步使人心情舒畅、思想活跃。9月份中共召开的八大宣布，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“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”了，毛主席也称“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”。知识分子皆大欢喜，一心想着向科学进军。这是人们心目中越来越宽松的一年，

谁也没有料到即将到来的反右风暴。

而国际上此时已是彤云密布，浊浪排空。在2月份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，赫鲁晓夫做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，斯大林的诸多错误甚至罪行，震惊全球。10月份，波兰事件与匈牙利事件相继爆发，苏军坦克开上了布达佩斯街头“平息反革命暴乱”。局势一片混乱，苏共和中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，也产生了分歧。

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共产主义制度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尖锐的矛盾、爆发如此剧烈的冲突？无产阶级专政、社会主义制度还行不行？社会主义国家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何处去？当其时也，世界上各种理论派别、政治力量吵作一团，莫衷一是。据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同志回忆，自从苏共二十大以后，中央书记处（在那年9月结束的八大以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）几乎每天都要开会，为我党有史以来所未有。

就在匈牙利局势急转直下、日益恶化，反共舆论甚嚣尘上之时，1956年10月底，为了正确分析国际形势、总结经验教训，毛主席派他的秘书林克同志，到新华社找一些同志交换意见。

当时的新华社国际部，可以说是国内唯一的国际“消息总汇”。除公开发稿外，他们办的《参考资料》一天要出3大本、十几万字，上午版32页，中午版24页，晚上版24页（有时32页），而且一定在早上8点、中午11点、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的办公桌上。林克解放后在新华社国际部历任编辑、参考消息选报组长，1954年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，主要帮助毛主席挑选国际资料和学习英文。在毛泽东的指派下，林克到新华社后，找到时任国际部主任的家父王飞、副主任李慎之叔叔，是再自然不过的了。

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。作为当时新华社国际报道的负责人，作为从

莫斯科到华盛顿，从华沙到布达佩斯，从赫鲁晓夫到艾森豪威尔，从哥穆尔卡到陶里亚蒂，铺天盖地外电的“第一读者”，在夜以继日的冲击下，王飞等人也在苦苦地思考、探索：斯大林、苏联、东欧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，其经验教训在哪里？中国共产党人该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？中国、国际共运乃至世界向何处去？

李慎之后来回忆：那时他们忧心忡忡，工作之余经常一起讨论，甚至到了寝不安眠、食不甘味的程度。他们觉得，看来斯大林不行了，赫鲁晓夫更不行，“希望只能寄托在取得胜利才7年而且领导着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，寄托在为全世界革命人民众望所归、一贯提倡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，而且素有宽容与开明之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，希望由他在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、为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一个成功的范例”（《关于“大民主”和“小民主”的一段公案》，原载1997年第5期《百年潮》）。

完全可以想见，当他们得知毛主席礼贤下士，要倾听他们意见建议时的兴奋心情。不料谏言上达天听后，风云突变，向党中央主席提的建议，很快就成了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纲领”，二人从此运交华盖，命途多舛。

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？他们当年向毛主席进了什么言，主席又是如何回应的？

林克当年撰写的《王飞、李慎之同志同我的谈话》，揭开了谜底。反右中，林克应要求，向新华社机关党委提供了这次谈话的记录稿，记录稿被新华社机关党委编为“1957年第52期整风资料”，在一定范围内印发，以为批判王飞、李慎之的罪证，遂得以连同他二人在反右、在“文革”中写了无数遍的“检查”、“交待”、“请罪”等材料一起保存至今，使我们能够管中窥豹，略见一斑，大体还原历史真相。

限于篇幅，下面对林克的谈话记录稿略作摘录（括号中的文字为林克原注）：

王飞同志首先发言：

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若干根本问题极想向中央领导谈谈。

看来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上完全靠苏联不成，中国党应该自己研究和提出一些国际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。

问题的实质：基本的意见是苏维埃社会式的民主不能解决问题。或者说，苏维埃式的民主基本未解决。

在苏维埃社会，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党的专政，由党的专政变成少数人专制而少数人专制变成个人专政。

由中央一直到村干，管得太多太死，不准有活动余地。如此我们党的威信越高，就越危险，有人认为反我就反党，我即代表党。由于有绝对的权力的人们形成了一个阶层，在这个阶层下边也形成了一个阶层，没有思想，没有独立思考，斯大林倒下了，别人就混乱了。

英、法、美政府倒台，就像换件衬衣一样，无论政府换不换，但整个社会是稳定的。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，如英明则没有问题，不英明，则解决时即要采取冲突的形式，而且不一定能解决得好。根本的问题即我们（指苏联）采取了集权专制主义。

如何解决：

1. 言论自由，新闻自由：

这是民主的实质。我们的报纸上的自由是在小问题上，现在言论不是独立的。领导人、领导机关的活动、领导机关的决策交给人民评判。这样人民确实有更大的选择能力辨别能力。

如果帝国主义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存在的情况下，还可以将情况公开，

为什么我们的制度不可以？应该可以发表不同政见的批评，但不能发表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言论。

2. 分权：

分权包括村干问题。党政要分开。削减某些部门的权力、某些组织的权力。不仅分权而且要削权，可以互相制约。

3. 选举：

我们认为中国现在的选举是间接的选举，甚至是中央的圈定。人民代表与其说是选举的，不如说是任命的，我们不应把选举变成虚伪的形式主义，人民不是阿斗。

4. 保密问题：

有些东西要保密；但是保密的东西太多就是说告诉老百姓的东西太少，人民不知道领导人如何活动、如何决策，结果培养愚昧主义，不能增加人民的判断能力。

这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发生什么问题，从长远来说中国可能发生问题，但目前还没有问题。这是为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，这可以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跃进、复兴。

对斯大林的估价与看法：

关于斯大林功过三七开的问题。完全同意对斯应作全面历史评价。但斯大林的功过是否值得三七开值得怀疑，如能分时期评价则更好。

个人崇拜问题：

各国共产党理论上是相信人民创造历史的，但实际上，共产党对领导人、高级领导的依赖思想过于以往任何朝代，这是非常矛盾的。

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，但是一个领袖威信高，可以引起不良的后果。毛主席聚集起来的威信要极其慎重防止被别人篡夺利用。

王飞同志谈完后，接着李慎之同志说：

为什么会发生波匈事件这样大的问题？

根本问题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民主问题，无民主则无社会主义。生产资料公有化和民主必须同时解决。

我们完全同意阶级路线，民主只能给予人民而不给反动派。但实际上专政不只专反动派之政，而且专到人民。

我们认为中国应当仁不让解决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。

我们党几年来一部分已成为一种衰朽的现象，国家大事，如果不通过党的系统则意见不能提出来，一切都统起来。系统严密这是我们党的好处，缺点是不容易听到意见（最后这一句话是我的回忆——林克）。

这可以从资产阶级牵制平衡、司法独立中吸取一些东西。现在小民主不少大民主不够。

现在许多事不是由人民判断而是由自己判断，不能锻炼人民的判断力。社会需要足够的弹性，能应付一切事变。中央限得太死，中央保守，有一定的愚民政策（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）。现在报纸太少了，过去中小城市都有报纸，一张报纸（不管是否是官方报还是党八股）也可发扬正气。

希望毛主席为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解决一个健康民主的问题。毛主席有极大的威信，这是历史造成，而不是个人崇拜，但不希望他的威信无条件地传给其他人。不希望对其他人感到失望。只要有民主，领导人差一点问题也不大。

我们现在的制度基本上是苏联的制度，缺乏弹性，应变和改革。但是在理论上现在就高瞻远瞩，在高级干部中现在就开始，走在苏联、波兰的前边是必要的。

要确立健康、民主、公正的全民舆论。

今天读来，这些意见依旧旗帜鲜明，切中时弊，掷地有声。然而事情

的发展完全出乎王飞、李慎之甚至林克的意料，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州路八千”。不久之后的八届二中全会上，毛主席在讲话中严肃批评了王、李。这个讲话后来收入了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：

“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，主张要大民主，说小民主不过瘾。他们要搞的‘大民主’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，学西方的‘议会民主’、‘新闻自由’、‘言论自由’那一套。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，缺乏阶级观点，是错误的。”

事实上，同许多后来发表的毛的文章一样，1977年毛选五卷出版时，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这段讲话，已经与吴冷西、林克当年向王飞他们传达的版本，不大一样了。

有这样一个花絮：看到毛选五卷后，王飞明知故问，给时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、党委副书记、当年向他们二人传达毛讲话的吴冷西打电话：怎么毛选里说的，与你当年传达的不一样了呢？吴也并不讳言：我们改了！

据王飞当年的检查交待，1956年11月，吴冷西传达了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，其中一段批评了他们。主席讲话大意是：新华社有两个干部主张搞大民主，是错误的。大民主是解决敌我矛盾的，人民内部矛盾，只能小民主，小小民主。也许，对死官僚主义者，可搞点大民主。主席还说，他们所提意见的错误一是阶级观点不明确，二是对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一点不明确。

因为工作忙，与林克谈话那天，王飞谈完后就先告退了，并没有听到李慎之的发言。得知主席批评他们要搞“大民主”，王飞一时摸不到头脑，赶忙去问李慎之。李也大呼冤枉，一再解释：他说的是我们在调资分房等小事上民主多，在国家大政方针等大事上民主少，并未主张什么“小民主不过瘾，要搞大民主”。

林克当时对毛主席的批评也感到突然。在吴冷西传达后的一两天，他又来找王飞说，他听了批评之后很紧张，担心是否是他传错了话。王飞即向他表示：“你不必担心，我相信你的记录是不会错的。”林克问王对主席的批评有何意见？王飞说：“完全同意主席的批评，还要好好消化消化。只是第一、我们并未主张搞大民主。第二、主席说民主是手段，不是目的，还未完全想通。民主作为上层建筑，可以说是手段，但作为斗争目标，如争取人民民主，似乎也可以说是目的。”对此，林克说，田家英也认为民主既是手段，也是目的，同你们一样。

过了些时候，林克又来转述了主席关于民主是属于政治范畴，是上层，服务于基础的意见，批评了认为民主既是手段，又是目的之说。关于李慎之所提他未谈到要搞“大民主”之事，一贯善于替别人归纳总结的毛泽东一言九鼎：你们提的意见，实质上就是要搞大民主。

“竟敢怀疑、反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评”，后来在历次运动中使王飞罪加一等，又多吃了不少苦头。

当年的王飞、李慎之希望毛主席在国际共运中“当仁不让”，发挥“中流砥柱”的作用，这当然是毛愿意听的；然而他们针对斯大林个人迷信错误开出的“药方”——改革政治体制（当然当时他们并未明确提出这一口号）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，则与毛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培植、发展对他个人崇拜的思路南辕北辙。现在看来，王、李毕竟是一介书生，对毛太过天真了。不过，恐怕当时谁也未能料到，从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他俩、声称不能搞“大民主”开始，在与斯大林模式分道扬镳之后，为了“反修防修”，为了清除“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”，毛泽东竟走了一条从“反右派”、“反右倾”、“四清”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更加专制、更加暴力的极左道路。不学斯大林，改当“马克思加秦始皇”了。

“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”。后来觉得“小民主不过瘾，要搞大民主”

的，恰恰是毛泽东自己。1966年他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极力推行以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为主要特色的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”。当然，这个所谓的“大民主”，与王飞、李慎之提倡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，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。

自称“末代清凉山人”的李慎之，1946年11月才从新华日报撤退到延安，到了清凉山上的新华社。他没有经过延安整风中的“审干”和“抢救运动”，没有认识到主席批评的严重性，口无遮拦，不知厉害，整风开始后又在国际部公开“鸣放”。如此不长记性，当然难逃一劫，李慎之被划成“极右”，开除党籍，发配劳改农场。王飞曾在延安呆了10年，好歹见过一点“世面”：在与林克谈话之前，尽管李慎之不以为然，他还是坚持请示了社长吴冷西，在得到“作为个人意见，可以说嘛”的允许后，才放胆进言；毛泽东批评之后，他不再做浪漫主义的幻想，在鸣放中噤若寒蝉。即便如此，最后他还是因“系统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，在反右派中严重右倾，对右派分子李慎之有包庇行为”，受到撤销党内外职务、降职降级的处分，下放农村劳动。不过与李慎之相比，总算网开一面，从轻发落了。

李慎之被划“右派”的过程，说来也是一波三折，颇具戏剧性：当时具体负责反右工作的新华社机关党委负责人，曾三次将李慎之的“右派”问题提交社编委会讨论，前两次都没有通过，于是便去请示国家机关党委。国家机关党委不仅立即认定李为右派，还批评了吴冷西的“温情主义”。有了“尚方宝剑”，编委会第三次讨论时，无人发表不同意见了。身为编委的王飞既认为李不应是“右派”，又觉得“参加革命以来，在敌我问题上与党发生不同意见还是第一次”，在违心同意划李为“右派”的编委会上一时百感交集，无以自解，竟哭了一场。

至于王飞不得不领受的“包庇右派分子李慎之”的罪名，就更加荒唐

可笑，主要依据就是他在编委会上不同意划李为右派。在上级党委定性之前，新华社多数编委都持反对意见，为何王飞在党组会议上发表意见，就是包庇呢？答曰：其他编委反对，是“温情主义”；你和李慎之是搭档，共同对林克发表了极其错误的意见，你反对就是有意包庇。如此诛心之论，让王飞百口莫辩，最后只能照单全收，否则后果更加不堪设想。

不过有一说一，对王飞、李慎之，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可是明确说过不给处分的。后来如此处理，不能由毛主席负责。当时吴冷西传达毛泽东的话说：“这两个人讲话很勇敢，他们是肯想大问题的，意见中也有可取之处。我既然批评了他们，就不要给他们什么处分了。”林克也来传达主席意见，说主席要他来告诉他们，“你们是好人，对批评不要感到紧张”，“不会给予处分”等等。林克还正式转达主席要与他们一起研读马克思《〈政治经济学批判〉序言》的邀请。对此，王飞推辞道：“我们是搞日常时事的，工作忙，水平低，实在不能研讨这些理论问题。”请林克代为恳辞。

当时李慎之作为工作人员，正陪同周总理出访亚欧 11 国。回来后听说“陪圣上读书”的机会居然被王飞托词婉拒了，恋恋不舍：“当时还不理解，以为能同毛主席这样的天才理论家一起读书是莫大的荣幸，一定可以得益匪浅，结果未能如愿，颇有惋惜之意。”（《关于“大民主”和“小民主”的一段公案》）1997 年看到李叔叔的文章后，我曾问家父王飞，为什么“婉拒”毛的邀请？他引用司马迁《史记 屈原列传》中的话说：“‘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，能无怨乎？’我当时对毛泽东已经失望了。”

毛主席的指示不是“一句顶一万句吗”？怎么不处分王、李的指示就不被执行了呢？

有人用鲁迅先生的名言解释这种现象：“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”。其实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。如果把那几十年中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

主要归结为有关责任人的个人品质，未免过于简单化。这里面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。在那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“与人奋斗，其乐无穷”的年代，为了“继续革命”，为了革命事业“千秋万代永不变色”，就要不断揪出、打倒反革命。当时历次运动中，实行的是5%的“末位淘汰制”，打击别人是保存自己的前提。不打倒别人，自己就要被打倒。没有最“左”，只有更“左”。这种比谁更“左”、比谁更疯的大赛愈演愈烈，“文革”中被包装成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”，在所谓“清理阶级队伍”的“群众专政”时期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
1956年那届新华社国际部领导班子的遭遇，就是个典型的例子。一正四副五个主任，除了一个后因长期患病，得以全身而退外，没过多久就全军覆没了：一个反右中被打成“极右”，开除党籍，劳动改造；一个反右后期被定为“严重右倾”，撤销党内外职务，降职降级，“文革”中更晋升为“三反分子”、“漏网右派”，斗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；还有一个反右中的积极分子更惨，没过两年忽然也被定为“阶级异己分子”，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，遣返回乡种地。硕果仅存的李炳泉是北平和平解放的有功之臣，因为地下党出身，不够“根红苗正”，解放后一直谨言慎行，勤勤恳恳，躲过了反右派、反右倾，在“文革”中竟被迫害致死。当然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这些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，但人死不能复生耳。呜呼，存者且偷生，死者长已矣！

在历经半年批判、检查之后，1959年初，家父王飞的处分终于尘埃落定。翌年，他被下放到黑龙江宁安县农村“劳动锻炼”。巧合的是，那里正是前清流放犯人之所。去国怀乡，忧谗畏讥，处江湖之远的他，想必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当时正是全国三年大饥荒中最艰难的时段，饥饿加上高强度的体力劳动，让他“见到麦苗都想吃”。那年夏天，我86岁的奶奶因患肝癌病逝，父亲赶回来奔丧。我当时才10来岁，但又黑又瘦、完

全变了模样的父亲给我留下的印象，至今记忆犹新：项上突出的喉结和暴露的青筋，在咀嚼饭菜时一动一动的，让人看了害怕。母亲非常心痛，那时每人每月的2两肉票，她再也舍不得吃，买了猪肉罐头存放起来，准备让父亲下放回来后补充营养。

同样印象深刻的是，大体同样时间，我到李慎之叔叔家去找他的儿子、我的“抹泥之交”李三达玩时，发现一向风流儒雅、书卷气十足的李叔叔，不仅又黑又瘦，还剃了个大光头，简直和穿街走巷蹬三轮的差不多了。当然，我只是感到诧异，没有多想，也没敢问。

1961年王飞结束下放回到新华社。当时农副产品极度短缺，全国人民都在挨饿，“非正常死亡”所在多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共中央决定对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实行精简，动员了2000万人回乡务农，“大办农业、大办粮食”。王飞向社编委会写了申请书，“坚决要求下放农业战线或其他基层工作”。并表示“自己身体健康，家庭、生活均无什么困难”，“绝不要以为我是在作一般表态也”。其实，当时他的5个孩子都在读书，最小的刚上小学。不难猜出他坚决要求离开自延安始、工作多年的国际新闻报道岗位的理由。吴冷西、朱穆之等社领导先后找他谈话，劝他不能消极，努力工作，此议遂罢。

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，新华社举办了干部轮训班，传达贯彻会议精神。经过反右派、“大跃进”和三年大饥荒，王飞的认识更进了一步：“毛主席也是人，人总会犯错误的，不能把毛主席神化。把主席神化，认为不能讲一句错话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，是别有用心的。”虽然轮训前曾信誓旦旦地宣称“不抓辫子、不打棍子，不带帽子”，但“文革”中王飞却又“新账老账一起算”，被“革命左派”打成“黑帮”、“三反分子”、“漏网右派”，关牛棚、劳改5年多，还一度在“吐故纳新”中被“军管会”开除党籍。林彪事件后，他才得以“解放”。

1956年，王飞刚刚年届不惑，李慎之只有33岁，用今天的标准衡量，还是个年轻人。在之后那段不堪回首的年月里，他们遭受的打击，不过是沧海一粟；整个国家、整个民族所遭受的损失，才更加令人痛心。

李慎之总觉“永远愧对老友”，“改正”后每年春节都要亲自登门，给王飞拜年，直到因病逝世。王飞暮年双耳失聪，脑力衰退，平日很少与他人交流，包括家人在内。但李慎之一来，两人一会儿促膝谈心，窃窃私语；一会儿高谈阔论，声震屋瓦，患难之交仿佛又回到了风华正茂、指点江山的当年。

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时，李慎之给新华社对外部原副主任、同样被打成“右派”的郑德芳同志（“改正”后任中国日报副总编辑）所出的证明中这样写道：

“1957年11月10日我写的材料，是在我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在压力下写的。但是我当时就不认为郑德芳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，因此，凡是按照当时流行的标准可以构成她右派罪行的材料，我都不愿意写。现在事隔多年已全部忘光，当然可惜的是，也就因此失去了一些可以证明她当年真知灼见的历史记录。”

我觉得，侥幸保留下来的王飞、李慎之1956年10月与毛主席秘书林克的谈话记录稿，同样也可称得上是“当年真知灼见的历史记录”。

曾有同志后来对王飞说，你的看法一点没错，就是早说了20年。

尽管为那篇讲话吃尽了苦头，王飞却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。1981年，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的他在一份自传中写道：

“本人一贯主张独立思考，探索真理，反对盲从，从不轻于苟同。1956年10月，在波匈事件尚未平息之际，毛泽东主席派其秘书来征求我们意见。我就国际共运与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些问题，系统地讲了一篇意见。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我们的意见。如果说“创见”，

那篇讲话可以算我个人的代表作。惜乎我这篇犯颜直谏的讲话，不但未被接受，反在反右及以后的历次运动中，长期受到批判、斗争，从而决定了我多年来在政治上的坎坷处境。所庆幸的是，1979年，新华社为我平了反，我在20多年前那篇讲话中提出的一些思想，今日已大部成为现实了。”

大部成为现实了吗？又是30年过去了，历史仍在曲折中前进。今天再看看王飞和李慎之半个多世纪前提的意见建议，仍有振聋发聩之感。他们当年的真知灼见，又真正实现了多少呢？

王启星

原载于2010年第8期《炎黄春秋》

2010年9月改定